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建构时间：现代 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Making Time: Time &
Management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理查德·惠普
芭芭拉·亚当
艾达·萨伯里斯 编
冯周卓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 (英) 理查德·惠普、芭芭拉·亚当、艾达·萨伯里斯编, 冯周卓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7

(时空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3-09915-3

I. 建… II. ①理…②芭…③艾…④冯… III. 时间—管理 IV. C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09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4094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10.75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祁传华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高霞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Making Time: Time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Making Time: Time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出版于 2002 年。本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发行。

总 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作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 19 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

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尔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

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

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年11月29日

前言

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我姐姐和我通常遵循两条时间准则：妈妈的时间和爸爸的时间。我们的母亲（当我写下这些时她已经 104 岁了，而且精神状况很好）出生在一个德国人家庭，她期望我们守时、准确和严格。责任在享乐之前，好东西要靠自己争取，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是规定好的必须遵守。我们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西西里人，他更灵活、随意，更具适应性。和他在一起我们不必严格守时，借口总是很轻易地被接受，有时连他自己也忘记曾交代我们去做什么了。

我们冬天住在巴勒摩市，夏天则在郊区的一个农场住上几个月。虽然农场离城里只有 30 公里，那里的时间习惯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地方，虽然当地居民并不怎么重视时间，然而，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却不一样。在城里，约会比在农场具有更精确的意义。城里居民认为，准时意味着预知他人会迟到，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人们遵循时间表和秩序。在学校，规定 9 点开始上课——当“准时”在 9:15 开始时，这 15 分钟的迟到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约定”。“Un’ ora è puntamento”在地方方言中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农民的时间在各个地方是否像许多书中描述的季节轮回一样遵循轮回的模式。在农场当然比在巴勒摩市更多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农场人们的头脑里被更清楚地体验为分离的实体。在城里，当我们说“明年”，可能是指在接下来的一年到三年之间的任何时间；在农场，“明年”依赖于正常的天气情况：降雨、温度、从非洲吹向南欧一带的非洲热风转动，等等。因为天气情况从来不确定，所以“明年”并没有很确切的意思。

在西西里传统的文化中，人类的智慧和经验比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重要。“逝去的时间永远不能找回”、“时间和潮汐不等人”，这些类似的谚语指出时间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不可浪费，然而“凡事皆有其自己的时间”、“每一次时间总是来来往往”却是更流行的谚语。最近的研究显示，尽管当西西里人面对短暂的停顿和不相干的耽搁时，表现得难以忍

受（因此我们对排队和频繁地按喇叭感到厌恶），却更容易接受长时间的耽搁，就像我们陷入一个有遥远结尾的长篇故事中。马西莫（Massimo）剧院，欧洲最好的剧场之一，被关闭了二十年之后才恢复。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习惯的基础历经多年仍然存在，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东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化而改变，一个“新西西里”正在快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社会应当以创新和发展的方式来保护和传承优良的传统。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世俗的时间和宗教的时间有不同的规则，到了 2001 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此。出差、参加体育运动或者看一场电影都不需要特别装扮，而参加宴会、去教堂做礼拜和欢度公共假日却需要穿上特定的服装。圣罗莎莉——巴勒摩的守护神一直在 7 月 15 日被纪念，而且庆典通常会提前两天举行并持续到节后两天。

我比我的同学提前读完中学和大学。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些年里，由于我比我的同伴的节奏都要快，我的生物时间倾向于把节奏变化内在化。我在学校跳了三级，这样就比我的同伴快了两拍。我跳级仍拿到了第一。事实上我积极而没有耐心，这或许是因为不安分而不是聪明。

我很快养成了在同一时间做几件事情的习惯，而不是一件接一件地做事。这样的行为正好适合我的工作环境，在那里人们被打断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而去做别的事，同时接受不同的约谈，与到访者谈话的同时接听电话，这些都是常事。许多年后，当我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变换工作时，这是我必须去适应的最显著的差异。这不仅仅是个守时的问题，当然对我来说，守时在巴勒摩、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是单一时间模式对适合于北欧的多元时间模式（在 Hall 所说的意义上^①）的问题。

我对时间的研究兴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因为一项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国际评估研究项目（IRPE）开始的。这个项目试图评估在企业领导高级培训学院以及另外七家欧洲商学院进行的管理开发程序的效果。我们针对认知效果的测量作了实验设计，试图测量学生的时间知觉、持久性、序列、周期性、时机把握和节奏感。作为一名专业的统计

① Hall, E. T., *The Dance of Life—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学家，我看到了“测量那无法测量的”魔力，我的荷兰同事彼得·尼吉坎普（Peter Nijkamp）这样来称呼这种练习。

的确，数字逻辑早就被大量应用于时间，其影响方式既多又不同，早在柏拉图时代，他就主张“时间的格式、永恒的变动图象、依照数字法则的循环”。区分时间的不同尺度和意义总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钟表时间对社会时间、心理时间对生物学时间、个人时间对牛顿时间、自然时间对形而上学时间——何时以及何地能观察到这些联系以支持理论家们的推测，这一点从来就不清楚。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关注更多的是，在不同文化和职业中的人们感受时间的方式，以及在管理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中时间与行为的关系。我是这样做的，用于测量时间知觉的工具大部分是量化方式，包括用语义分化技术测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

既然在我之前的时间间隔比在我之后的时间间隔要短，而且经验和智慧也趋向于有更大的间隔，我不再确信这种方法最能使科学家在时间研究的进展上获得有效的结果。纵观科学的历史，常见科学家们围绕质和量展开争辩，持久而激烈。甚至人们因对待时间的态度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正如普利高津（Prigogine）所指出的：“科学家不读莎士比亚，人文学者不了解数学的魅力……这种两分的现象因为更深层的理由而存在，时间观念也以融合这两种文化（科学的和人文的）的方式而存在。”^①

无论关于时间和时间性的争论在哪个领域，不管运用哪种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科学家们似乎正更多地分享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不必提及用“更好的”方式运用操作的可能性——不能固定为任何刻板或图式的形式，因为它会忽略态度、感觉、情绪、希望、恐惧，及其他构成时间存在本质的人类体验。因此，本书没有落入单方面思考的俗套，而是叙述多种不同的观点和实验，那些打算花时间更多地了解时间的人需要带着兴趣和快乐来阅读本书。

加百利·莫瑞诺

2001年6月7日于巴勒摩

^① Prigogine, I., *Les Lois du Chaos*, Paris, Flammarion, 1994.

致 谢

本书是因为编者对时间和管理的长期兴趣而产生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大卫·马松（David Musson）对本书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使得本书得到一个及时适宜的出版机会。对于他的热心支持和友善幽默的指导，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本论文集的编撰在短短的 200 天内完成，期间我们组织了数次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这些会议的组织者，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讨论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们。这些学术活动是：由企业领导高级培训学院（ISIDA）主办、在巴勒摩举行的第三次“时间与”学术会议（由 Morello, Adam, and Sabelis 共同组织），以及欧洲管理集团在多伦多举行的“组织、管理和时间”工作会议（Adam, Purser, and Whipp 参加）。同时要感谢布莱克韦尔出版集团允许在表 1.1 中使用格兰特（R. Grant, 1998）在《当代战略分析》中提出的“企业战略演进表”的修改版本。我们还要感谢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三位评阅人的评论，他们的评论对本书的最后定稿帮助甚多。最后要感谢卡迪夫商学院的莱斯莉·普罗门担任了国际项目的联络工作，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格温·布斯提供了技术支持。

作者简介

芭芭拉·亚当是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时间研究的开创性权威，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时间和社会理论的。她是《时间和社会》的创始编辑，并在该领域发表了约 100 篇论著。她的主要著作包括《时间与
社会理论》（Polity, 1990），《时间观察：时间的社会分析》（Polity, 1995），《现代性的时间步伐：环境与看不见的危险》（Routledge, 1998）。

彼得·安东尼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中心的教授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管理学习、管理的道德规范、员工合作的管理。代表作有《组织学习的对话分析》，载《管理研究杂志》，37/6（2000），887—901（with C. Oswick, T. Keenoy, I. L. Mangham, and D. Grant）。

爱玛·贝尔是沃威奇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的讲师。她的研究侧重于文化、消费和组织精神。最近发表的文章包括：《组织人种文化群中的劳工谈判》，载《国际社会研究方法论杂志》，2/1（1999），17—37；《人事管理中的人力投资和专业知识的标准化》，载《管理学习》，32/2（2001），201—219；《组织薪酬系统的社会时间》，载《时间和社会》，10/1（2001），45—62。

德克·邦泽尔是基尔大学管理系讲师。他的专业兴趣是人种文化群和批判管理研究，他的研究重点是组织中的权力和认同。他最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西悉尼大学客户服务的离散结构》，而且参与了苏格兰呼叫中心 and 软件公司的“工作的未来”的研究。

大卫·格兰特是悉尼大学工作与组织研究系的高级讲师。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将组织话语理论应用于雇佣问题；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人力资源的社会构造、心理契约以及工会和劳资关系。公开发表过的论著包括：《话语与组织》（Sage, 1998）（与 T. Keenoy 和 C. Oswick 合编）；《组织学习的对话分析》，载《管理研究杂志》，37/6（2000），887—901（with C. Oswick, P. Anthony, T. Keenoy, and I. L. Mangham）；《从外部语言到内部语言》，载《应用行为科学杂志》，36/2

(2000), 245—258 (with R. Marshak, T. Keenoy, and C. Oswick); 《话语、组织与组织化: 概念、对象和主体》, 载《人类关系杂志》, 53/9 (2000), 115—124 (with C. Oswick and T. Keenoy)。

洛雷兹·希达是 Thomas B. Thrige 应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并且是哥本哈根商学院管理、政治学和哲学系研究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在哥本哈根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近期研究成果有: 网络中的帕拉静态他律 (1997); 相互作用的原子 (1998); 网络中的黑洞 (1998); 频繁飞行项目 (1998); 丹麦的业主经理 (1999); 时机学 (2000)。公开发表的论文包括: 《在市场困境中争取消费者》, 载《国际商业评论》, 5/5 (1996)。

汤姆·金诺依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中心的管理学高级讲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通过就业关系的建立、管理、控制和完成来了解社会过程。现在的工作包括: 人力资源管理的话语分析研究、组织的时间背景 (timescapes)、学术认同以及雇员合作管理。他的专长是话语分析、工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雇佣关系。发表的论著包括《话语与组织》(Sage, 1998, edited with D. Grant and C. Oswick); 《立体人力资源管理》, 载《管理研究杂志》, 36/1 (1999), 1—23; 《组织学习的对比分析》, 载《管理研究杂志》, 37/6 (2000), 887—901 (with C. Oswick, P. Anthony, I. L. Mangham, and D. Grant); 《从外部语言到内部语言》, 载《应用行为科学杂志》, 36/2 (2000), 245—258 (with R. Marshak, C. Oswick, and D. Grant); 《话语、组织和组织化: 概念、对象和主体》, 载《人类关系杂志》, 53/9 (2000), 1115—1124 (with C. Oswick and D. Grant)。

大卫·赖茨是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 组织分析学教授。他是《性别、工作和组织》杂志的编辑, 最近发表的论著有: 《流程再造革命: 企业变革的危机研究》(Sage, 2000, edited with H. Willmott); 《管理者的生存: 工作组织中的权利和认同》(Sage, 1999, with H. Willmott); 《抵制官僚制的时机和质量管理创新》, 载《社会学》, 34/3 (July, 2000), 421—436 (with D. McCabe); 《自治——保持! 后现代人文主义女权运动的问题和视角》, 载《管理探究杂志》, 9/2 (2000), 173—186。

保尔·塞吉斯·柯库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佛罗里达

大西洋大学商学院的商业副教授。他拥有 MBA（市场营销方向）、MBA（财务方向）和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罗格斯大学获得金融和营销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财务—营销结合、信息经济学、健康经济学、战略营销管理。他发表了有许多同行评论的论著。

海金·李是布鲁内尔大学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讲师。他的专长领域是信息系统、时间和信息技术。他是信息社会杂志时间和信息技术专版的特约编辑。他已经在《组织研究》、《会计》、《管理和信息技术》、《时间与社会》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时间和信息技术文章。近期发表的包括：《组织研究中的时间：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载《组织研究》，20/6（1999），1035—1058（with Jonathan Liebenau）；《信息系统对商业过程的时间影响：集中于时间性的研究》，载《会计、管理和信息技术》，10/3（2000），157/185（with Jonathan Liebenau）。

乔纳森·利本努是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信息系统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信息的基本概念（时间性、语意学、交易等）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治与经济特性。他已撰写了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专著和论文，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将不同水平上的信息基础建设中的概念、政策、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整合起来。近期发表的论著有：《组织研究中的时间：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载《组织研究》，20/6（1999），1035—1058（with Hee-jin Lee）；《信息系统对商业过程的时间影响：集中于时间性的研究》，载《会计、管理和信息技术》，10/3（2000），157—185（with Hee-jin Lee）。

艾恩·曼亨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中心的教授研究员。他主要是从戏剧性视角进行组织分析，近期的研究工作包括：公司剧场、管理行为的戏剧实质、组织中的情绪研究。公开发表的论著有：《组织学习的对话分析》，载《管理研究杂志》，37/6（2000），887—901（with C. Os-
wick, P. Anthony, T. Keenoy, and D. Grant）。

加百利·莫瑞诺是位于西西里巴勒摩的管理发展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也是巴勒摩大学经济系企业统计与营销研究教授，还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系营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在所有欧洲国家、美国、拉丁美洲、中东、印度、中国、南非、日本和澳洲，作了大量关于私人和公共、国有和跨国公司方面的演讲，并引领着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他正在与哈瓦那大学合作致力于古巴 MBA（企业管理硕

士)教育的发展。他担任过欧洲民意与市场研究协会(ESOMAR)、管理培训中心欧洲协会(EAMTC,现在是EFMD)、意大利营销协会(AISM)、意大利商学院联合会的主席。他用几种语言发表了大量关于时间和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道恩·卡斯比编辑了《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管理视野中的时间》(ISIDA, vol. 14; Palermo, 1997)。

西本郁子于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埼玉大学教授英语。她的研究兴趣在时间和空间的民主秩序理论,她发表的关于时间的文章有:《时间的文明:日本和西方时间系统的采用》,载《时间与社会》,6/2-3(1997),237-260;《作为效率的“和谐”:“准时”生产制是日本独有的吗?》,载《时间与社会》,8(1999),120-140;以及一篇合作研究关于日本教育系统中的时间规训的论文《迟延的起源》,载《日本评论》(即出)。

克里斯廷·罗斯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管理系的助理教授,他的专长是管理的系统理论、制度动力学和变革的理论、时间和管理研究。发表的论著有:《时间与管理:对管理行为败德理论的反思》(Wiesbaden: Gabler, 1997);《组织的再造变革:平衡逻辑与超越》,收入S. J. Hablovic编《管理学院2000年会议优秀论文集》(Toronto, 2000, with G. Schreyogg)。

帕莫拉·欧迪是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社会学讲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性别、消费时间和社会理论。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解构时代的时间产生》,载《时间与社会》,8/1(1999),9-38;《女性市场:营销事实还是幽灵幻影?》,载《消费市场与文化》,3/2(1999),1-29;《时间问题:消费中女性市场的重要性》,载D. Brownlie, M. Saren, R. Wenslay和R. Whittington编《营销的再思考:走向批判的营销会计学》(Sage, 1999),126-144(with D. Knights);《规训的主体:公民教育和财政上自我规训的主体》,载《学校领域》,10/3-4(Autumn-Winter, 1999),127-5s(with D. Knights);《准时制:表象时间的流行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营销话语的影响》,载P. Daniels, J. Bryson等合编《知识、空间和经济》(Routledge forthcoming, with D. Knights)。

克利夫·奥斯威奇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中心组织分析高级讲师。他的研究源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主要集中在组织话语和组织变革过程中的语言使用;近期研究包括话语比喻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建

构,以及老年人歧视。已发表的论著有《话语与组织》(Sage, 1998, edited with D. Grant and T. Keenoy);《组织学习的对话分析》,载《管理研究杂志》,37/6 (2000), 887—901 (with P. Anthony, T. Keenoy, I. L. Mangham, and D. Grant);《从外部词语到内心世界》,载《应用行为科学杂志》,36/2 (2000), 245—258 (with R. Marshak, T. Keenoy, and D. Grant);《话语、组织及组织化:概念、对象和主体》,载《人类关系》,53/9 (2000), 115—124 (with T. Keenoy and D. Grant)。

罗纳德·E·珀瑟是旧金山州立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现在担任管理研究院组织发展与变革分会主席。他是四本书的合作者之一:《会议研究》,(Josséy Bass, 1996, with M. Emery);《自我管理的组织》,(Free Press, 1998, with S. Cabana);《社会创造力》第一卷和第二卷 (Hampton Press, 1998, with A. Montuori)。在最近的管理研究院 2000 年学术会议上,他组织了一次重要的研讨会:“管理中的时间之维:揭示矛盾,探索新的可能性。”他的近期论文《实时环境中的危机来临:一项速度学的分析》,被选入管理研究院 2000 年学术会议的优秀论文集。

阿尔弗·瑞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和工业经济与管理系,完成了他关于超现代礼品经济的博士论文。除关于礼品经济的研究外,他还研究管理与技术中的道德化过程和轻佻行为问题。

艾达·萨伯里斯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文化、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学者。担任《时间与社会》杂志的评论编辑,也是冈萨罗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公司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管理多样性国际组织咨询机构。主要论著有:《关联中的矛盾:当代组织中似是而非的困惑》(自由大学出版社,1996, edited with Willem Koot and Sierk Ybema);《高层生存:复杂性时代的高层管理者》(Utrecht: Lemma, 2000, with Willem Koot)。

让-艾克·托恩鲁斯是芬兰埃博学术大学国际营销学的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工业营销及网络和跨文化营销管理,主要论著有:《企业网络演化中的角色嵌入》,载《斯堪的纳维亚管理杂志》,14/3 (1998), 187—205 (co-authored with Aino Halinen);《东欧商务活动的发展:基于案例分析的学习和网络视角》(Kikimora Publications, 1999, co-edited with J. Nieminen)。